

中國經濟論

中國學術叢書

中國經濟原論

王亞南著

中國經濟學科主編

經濟科學出版社發行

中國經濟原論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著作者 王亞南
發行者 經濟科學出版社
印刷者 福州倉前山長風印刷所
經售處 永安橋尾全國各大書店

當年那種的讀書是那樣的，學一課書高興得是無比。學生三四年來，前半段時有一點點的缺，這回就全部可謂圓滿了。算一算積分也不外乎那樣的成績回來，成績單中，成績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青絲會並非中不難來而竟得以得高成績，令他飛速地在當時是十分驚奇的。他想：「我本資非良，到年齡尚實能深造者，本可無往不勝，而既無此幸，則一再

序言

吾生所不遺，中在二年三十三、四年十五、五年十三、六年歲歲以迄。」而讀書過後一山頭而上，書大部畢，即歸里，歸家。受到的學術影響高遠而階級由，家山學業是甚，但中間頗有對山川食宿，衣冠服中等處，現在拿來與讀者見面的這部書——「中國經濟原論」，就寫作與出版的過程說，都算是相當難產。

民國二十九年我在國立中山大學擔任高等經濟學這門課程；顧名思義，當然需要講得高深一點。我於是選定里嘉圖 (David Ricardo) 所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作為講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許因為同學原來所學基礎太差，一半也許因為我自己解說表達的能力不够，我發現同學對於這門課程感到十分興趣的並不很多。就在同時，我還擔任有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這兩科。讀中國經濟史的是四年級的同學，讀高等經濟學的亦是四年級的同學。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講，我相信我講里嘉圖的經濟學說，還應比講中國經濟史有較大的把握，但同學對後者表示的興趣，却遠較前者為大。我當時就感到，這原因，不當完全求之於里嘉圖那部大著的難讀難講（以謙虛見稱的里嘉圖，當他把那部書拿去問世的時候，他竟表示：全英國是不是會有二十五個人懂得），而更應追問到：中國一般研究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在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的限內，他是否有理解這樣抽象的理論之必要，或者至少，他們所研究的抽象理論，是否能拿來同現實，特別是中國經濟現實發生認識上的關聯。由於這一種感想，我對於中國大學講壇上，關於經濟學以及一切有關經濟學課程所採取的教材與教法，就感到大有革正之必要。我當時所寫的，而放在本書後面作為附論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一文，正是那種意念的具體表現。

在民國三十年，我還是擔任高等經濟學，還是把里嘉圖的經濟學作為底本，不過，每講一章，比如講價值論或地租論，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結論，拿來說明中國的商品價值，中國的地租，如何非里嘉圖所研究的範疇，或者，里嘉圖所研究的經濟範疇，如何可以從反面來證示中國社會經濟的非資本主義性。這個講法，馬上使一般同學發生興趣了。研究經濟學或者研究什麼經濟理論，本來是為了拿來作為理解或研究現實經濟的手段，但一般却像行所無事的把這種意思弄錯了。

在以後幾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中，我不但在講高等經濟學的時候，丟開了里嘉圖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經濟理論，尙論到中國經濟，即分別由價值論展開中國商品價值的研究，由利潤利息論展開中國利潤利息形態的研究，並還把經濟學一門功課也擔任起來，編出一個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研究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綱要，在講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經濟形態之後，緊接着就講到中國有關經濟形態的相同相異點，以及時下流行的國人有關那種經濟形態的不正確認識，並分別予以譯正。刻下，後一部講稿，正由當時負記述責任的一位青年朋友在幫同整理中，而這幾年高等經濟學的講義，則大體是本書的主要構成部分。本書原本來，在高等經濟學講述的過程中，為了這樣的講法，這樣的研究方法，是一種新的嘗試，需要分別把它撰述出來，就正於海內的高明，所以，本書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會分別發表於中山文化季刊、廣東省銀行季刊、時代中國等雜誌。在民國三十三年初，承桂林文化供應社主持人萬民一、萬仲文昆季的友誼與盛意，使這先後依照一定計劃寫成，但却是分別發表的諸論文，得有集印的機會，於是我就中國現代經濟的全般發展情形，及中外學者對於中國經濟本身認識的演變情形，寫了一篇長達三萬餘言的緒論，作為第一篇，而全書則題稱為「中國經濟原論」。但事不湊巧，「原論」的紙版剛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在這以後不久，我亦由中國立中山大學的所在地廣東坪石播遷到福建來。永安東南出版社計劃印行《大學學術叢書》，希望我把原來交給文化供應社印行，但卻未出版的這部書稿，拿來再印，我當時曾函文化供應社的負責人商談，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沒有回響。我當時設想，為了文化的意義，另行在東南印行，一定能邀

得朋友的諒解。況該書的紙版是否搶出還有問題，於是我就決計整理舊稿，交由東南出版社印行。但在整理的開始，就發現作為緒論的第一篇原稿遺失了；不久，東南出版社突如因為一陣政治風波，把負責人吹得散逸無蹤了。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直等到有志於中國經濟之科學研究的朋友們，組織了經濟科學出版社，並希望我首先把這部書稿提供出來，我這才重新鼓起勇氣，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範圍內，對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訂。

後面增附的五篇，其中，「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因為可以幫助理解中國資本形態，所以從拙著「中國經濟論叢」中移植過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因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般人對中國經濟認識的錯誤，所以也從拙著「經濟科學論叢」中移植過來。至「原論」全書所論究的各種經濟形態，大體是就私經濟立論的，對於有關中國財政方面的情形，沒有直接明顯述及。這就「原論」所研究的範圍來講，雖不一定是什麼缺陷，但探究中國經濟運動的整體，顯然是不能忽視這方面的直接間接作用的。我把最近為福建省研究所編研究彙報寫好的「中國公經濟研究」一文附錄在這裏，也許多少能幫助我們看出那種作用的限度。

本書是嘗試把中國經濟全體，當作被若干基本經濟法則所貫澈着的統一過程或統一運動。因而，各別經濟形態相互間的內在因果關聯，是我特別想努力分析的。本書的最後一篇或第八篇，雖是當作結論，當作一切基本法則作用最後必然歸結到的後果，但由於資料的不充分和我個人研究能力的限制，我十分坦白的承認，這部書極其限，也許只能算是中國經濟之科學的研究之發端。不過，照一般流俗的見解，以為研究中國經濟，沒有把近十年來國內經濟在戰時的諸種變動指述出來，就失掉了現實性，但請這樣設想的人們留意，那樣的研究要求，是很容易由他們自己得到滿足的。而我則是希望對中國經濟何以會演成戰時這種局面，有一個更基本的的理解和說明。他們只能責難我的學力不够達成我的企圖，而沒有理由說我的研究忽視了現實。

我深知道：如其是在十年以前，像我這樣一部不完備的東西，也許根本就無法產生出來；如其是在十年以後，它的內容和體制，也許會更完備一些。我這樣說，顯然不是就我個人的造詣立論，而是就我們所在社會的學術界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研究的成果立論。這即是說，這部書稿用我的名義來問世，它實是近十數年來，大家分別由各種不同的視野，對中國社會性質，予以比較深入研究的結果。沒有大家已有的這種研究作為基礎，我就不但無法採行這樣的研究方式，且也不會引起這樣來研究中國經濟的動機。不過，我這裏所謂「大家」，實應包括有關這方面研究的國外學者，特別是蘇聯學者和日本學者在內。他們直接間接關於中國現代社會或一般前資本社會或殘留有濃厚封建因素的資本社會的研究成果，實給予了我莫大的激勵與啟示。

在研究過程中，不時給予我以鼓舞，並使我的研究，不得不繼續努力下去的，是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系乃至全校有志於中國社會經濟之科學研究的同仁與同學。他們每有機會，就提出有關方面的問題來同我商討，這樣，我便經常像是處在被考試者的地位。中國商品與商品價值的研究，剛剛研討出一個頭緒，他們又要求我依此說明中國的貨幣、資本……等等。不管我的考試是否及格，而我像經常被安置在被考試者地位却是一個事實。我在這當中，才比較理解到所謂「教育者在不斷被教育」的意義，亦就因此之故，不管國人怎樣理解中山大學，我總覺得那是一個有生氣、有活力，特別富於時代感的學校，只要稍加繩墨，領導有方，那是格外容易顯出學術研究的展望的。

就個別給予我的幫助的朋友講，中山大學法學院現任院長胡體乾先生，應當最先被數到的。他是一個極淵博的社會學者，我們在幾年同事中，幾乎每天有一次聚談的機會；當我們彼此把講述的問題交換意見的時候，他總能從正面或反面給予一些補充或提示。而對於資料的提供方面，他的助力尤多，有關中國經濟研究的一些重要雜誌，他都全部保存着；如讀書雜誌、如中國經濟、如食貨、如中國農村等等，都是從他那辛苦積得而且在戰時更辛苦搬移的個人書庫中取得的。

其次應當提及的，是現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郭大力先生。我們在戰爭的過程中，雖只有一兩次短期的共處，我們分別的研究，雖大體達到了共同的結論，但不僅他的「我們的農村生產」那部精闢論著，是在我研究「原論」過程中出版，給予了我不少的啓示，並且我的全部研究，直接間接所負於他的地方是很多的。這部書在出版前未得到他的全面校正，應是一個大的缺陷。

再次，現任中山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梅裏彬先生，曾對本論全稿作了一次詳審的鑑定，並提出了一些補充的意見。值得在此表示謝忱。

至若在出版方面直接間接給以莫大助力的，首先當感謝福建省研究院院長周昌雲先生。同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章振乾先生，始終是我一切研究努力方面的助成者和鞭策者。而這部書得從速與讀者見面，則多虧了余志宏、張來儀兩位先生。他們不僅為我擔負起了印刷上的校訂責任，且是多方鼓勵我把這部書從速問世的策動者。

把「始生之物，其形必醜」的格言，用來形容這部書，是再妥當不過的，我現在以十二分的誠意，靜候我們學術界的善意的和建設性的評判。

王亞南 一九四六年元旦於長汀國立廈門大學內倉頡村野馬軒

中國經濟原論

目次

序 言	1
第一篇 中國經濟研究總論	1
一 中國經濟研究的三個階段	
二 中國經濟科學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二重必要	
三 研究中國經濟應依據的幾種科學及其應採用的幾種方法	
第二篇 中國商品及商品價值形態	22
一 中國商品形態	
(一) 商品是一個歷史的經濟形態	三
(二) 表徵着中國社會的商品標本	四
(三) 中國商品的類型	五
二 中國的商品價值形態	
(一) 商品·價值·價值法則	
(二) 在價值律下顯出的中國商品生產的不完備形態	
(三) 中國商品價值的一般特徵	二

第三篇 中國貨幣形態	40
一 關於貨幣的基本認識	
二 中國貨幣的特殊表象	
三 中國貨幣的諸機能	
四 當前貨幣上諸問題的分析	
第四篇 中國資本形態	60
一 資本及有關資本發生發展的總概念	
二 中國各種資本形態的量與質的考察	
三 中國資本累積、集中、分散的總運動	
四 當前資本上諸問題的分析	
第五篇 中國利息形態與利潤形態	95
一 利息利潤及其相關聯的諸法則	
二 中國的利息形態	
三 中國利息形態對於利潤的規制作用	
四 中國商業利潤形態對於產業利潤的規制作用	
五 中國利息利潤的綜合觀察及其在當前的新姿態	
第六篇 中國工資形態	119
一 勞動形態與工資形態	
二 中國傳統的僱傭勞動關係	
三 由傳統僱傭勞動到現代僱傭勞動的推移	
四 中國僱傭勞動的質與量	
五 從工資形態上看出的各種掠取關係的現實基礎	
第七篇 中國地租形態	143
一 由封建制地租向資本制地租轉化的歷程	
二 中國地租的一般現象形態及其特質的把握	

- 三 由商品貨幣關係發展限界上表現的絕對地租與差等地租的暗影
- 四 土地所有形態與土地經營形態範圍着的現代性地租的發展
- 五 在農業資本構成與農業僱傭勞動上表現的地租特質
- 六 地租的疊積與轉化

第八篇 中國經濟恐慌形態..... 169

- 一 在兩種典型的恐慌形態之間
- 二 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的特點
- 三 傳統經濟恐慌與經濟現代化
- 四 市場關係的擴大與現代經濟恐慌的諸表現
- 五 從全般經濟法則作用下體現出的恐慌基因及其後果

附論一 中國商業資本論..... 189

- 一 全文的集注點
- 二 商業資本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的興衰繼絕關鍵
- 三 鴉片戰役以後的商業資本
- 四 抗戰發生以後的商業資本
- 五 當前商業資本所造出的危害及其所受到的限制
- 六 商業資本活動的限界及其轉向產業資本的可能途徑

附論二 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 214

- 一 問題的癥結
- 二 有關資本流通問題的幾個基本認識
- 三 在古典形態下予以新裝的中國商業資本
- 四 戰時商業資本的工業資本化與工業資本的商業資本化
- 五 解決工業資本問題的前提條件
- 六 四個結論

附論三 中國公經濟研究..... 224

目次

一 引言	二
二 現代公經濟發展的歷程	四
三 中國傳統經濟形態中之公經濟的性質	五
四 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公經濟活動的成果	六
五 在戰時公經濟措施上顯出的諸般特質	七
六 中國公經濟的可能展望	八

附論四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238

一 當作舶來品輸入的政治經濟學	二
二 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三
三 我們一向在研究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四
四 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五

附論五 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 262

一 題旨的說明	一
二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	二
三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向世界各國的傳播	三
四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傳入中國的原委	四
五 中國經濟學界充滿着奧大利學派經濟思想的實話及經濟實踐上 反映出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意識	五
六 奧大利學派經濟學對於民生主義經濟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	六
七 經濟學者的責任	七

*品性的實踐者全在內地方面，而滿州的本質則更為深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變升天一舉滿洲即隨之而告終矣。但其後非苟圖安，而式微則由內憂外患及民變所逼迫，雖主坐知本，猶如歷朝制氏族命卒以滅。得於聯繫內務府武官就始而不斷續而生坐外而，朱儕的統領強烈，外人南渡水旱無收，極大的變局由，是以東南葉由時謀反恨道戰亂思補，中尼羅河第四次小，中出敵方非北伐兵，其實和朱彊隨軍包圍了。

第一篇 中國經濟研究總論

一 中國經濟研究的三個階段

正式把中國經濟研究的問題提出來，正式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二十年的歷史。我們今日來檢討這方面研究的成果，雖仍覺得很是有限，但如衡以這短促的時間，却就毋庸說是特別值得稱許的。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從客觀條件方面講，大體可以說是得力於以次兩點：即我們實踐上的緊迫要求，和當代世界現實明確呈顯了一部社會發展史的圖樣。而後一方面世界發展的總傾向，又顯然是直接間接會在前一方面發生敦促作用的。

這裏且就此種關鍵，來說明中國經濟研究上的幾個階段。大體上，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後數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一個階段；七七事變發生以前數年，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而由抗戰至現在，則可算作是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亦即在這裏提稱的中國經濟研究的現階段。我現在來分別簡述這各階段研究的特徵及其全般動態。

第一個階段所說的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間，那大體是指着由民國十六七年到民國二十一年。這個期間何以特別會引起對於中國經濟研究的要求呢？大家試回想到當時的社會政治上的變動情形，就很容易明瞭此點。在民國十五年北伐以前，中國雖壇上間或也有關於中國經濟論述的文

字，但無疑都是零碎片斷的，而比較觸到了中國經濟之全般特質的作品，倒毋庸要數到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而作為這次宣言之理論依據張本的民生主義，其重要點主要是放在積極的創建的方面，至關於非採行民生主義經濟不可的現實經濟基礎的詳細分析，國民革命勢力伸展到武漢、南京以後，由局勢的大變，必然導來從理論上檢討實踐歸宿的要求，而在前此北伐過程中，在五四運動展開過程中，依學術思想解放所接觸到的雖然是有限得很的新興社會科學知識，却顯然大有助於那種要求的實現，於是，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研究的問題提出了；集中在新思潮，讀書雜誌等刊物上的許多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如王學文先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將來，潘東周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以及主要由批判王、潘而引出的嚴靈峯先生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任曙先生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乃至主要由批判嚴、任而發表的劉夢雲先生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伯虎先生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劉鏡園先生的評兩本中國經濟的著作和中國經濟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預測，……差不多都是民國十八九年到二十一年這幾年中發刊的。它們的中心論點在探討中國經濟具有何種性質。王、潘兩先生都主張「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認定「在中國經濟中佔優勢的，佔主要地位的，是半封建經濟」，而「所謂中國資本主義，所謂中國民族工業，仍處在資本主義初期輕工業的階段」。反之，恰好與他們站在相反立場的嚴、任兩先生，又認定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作為其理論前提的論點，是把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一同看待，是把外人在華資本與中國民族資本一同看待；既然中國人的小企業，外國人的大企業，「僅僅存在數量的差別，而沒有質量上的差別，兩者都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勢力……」（嚴）；「既然在中國境內的華洋兩種資本主義，是當作統一中國經濟看待的，那麼，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工廠、商店、鐵山、輪船及鐵道資本等，再加上土著資本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店、鐵山、輪船、鐵道等，就足以壓倒封建經濟，而支配全國生活」（任），所以，「中國已達到了革命前俄國的經濟基礎」。劉鏡園先生儘管大體上站在嚴、任同一的立場，但却覺得把中國經濟遽以資本主義經濟自之，似乎過火了一點，於是打折扣，提出「落後資本主義」的名目來。中國經濟性質的論爭，雖不會到此

終結，但顯然在這裏告了一段落，即結束了我之所謂第一個研究階段。八
在這一個階段研究的最大收穫，與其說是解決問題，毋甯說是提出問題。探究中國經濟的性質，這已經可以說是科學研究的起點。我們今日把那時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翻讀一遍，無疑會發現出許多幼稚而膚淺的議論；即使某一方面明白提出了迄今還視為相當健全的命題，比如所謂新思潮派（何幹之先生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一書中稱王學文先生等為新思潮派）提出的「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云云，那同我們今日大家大體一致首肯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經濟」，只不過是文字表現上略有區別。可是，站在理論研究的立場上，我在此着意的，毋甯是他們研究出他們那種命題，或支持他們的論點，所採取的方法。不論是他們抑是他們的反對者，都似乎只在「資本主義」、「民族資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經濟」一類名詞上反覆作註腳式的說明，分別摭拾一些中國經濟上的表象，拿來與名詞相比合。結局，他們彼此雖在要求研究中國經濟的本質，而從他們的種種論斷中顯出來的，却不過是那種本質的極曖昧，極閃爍不定的片斷；並且，他們的考察，還大體是局限在都市產業方面，或從消極觀點，斷定其尚是封建經濟佔優勢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或從積極觀點，斷定其已發展擴大到支配全經濟生活的資本主義階段；至若作為都市產業依存基礎的廣大農村經濟，是不大為他們注意到的，因為他們用以詮釋中國經濟性質的方法，還不允許他們把研究拓展深入到這個視野。

第三個研究階段是指着由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這個期間。

這個研究階段緊接着前一階段，把前一階段提出的問題，或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探討。如其說，前一階段研究的視野，大體局限在都市經濟方面，這一階段研究的重點，就大體移到了農村經濟方面；但還不止此，前一階段的研究，所着意的，無非是中國經濟上比較突出的一些表象，和為了說明那些表象所需提論到的社會科學上的一些術語；而這一階段的研究，就比較更接近中國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更接近了中國經濟本質研究的方法論。

為什麼時間相隔不久，研究上就有這種進步呢？我們原不忽視「九一

八一事變前後這些年間，正是新興社會科學在中國學術界以快速步調傳揚的時期，而蘇聯及日本社會科學者對於中國經濟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更益以中外學術研究機關，和社會事業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金陵大學、華洋義賑會等所作的種種農村經濟調查，顯然皆有助於我們在研究上採取更深入的步驟。較早的廣東省農業調查報告，至一九二九年才全部出版；馬策爾(L. Madjar)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大綱亦是同年草成，於一九三一年譯成中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會調查所的調查工作，係開始於一九三〇年，而於此後數年中，連續發表其調查研究結果；布克(J. L. Buck)的中國農家經濟亦係一九三〇年出版。所有這些調查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著作的翻譯介紹，都只能說是我們這一研究階段的主觀條件方面的準備工作，我這裏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當時的客觀情勢。

一九二九年以後的戰後世界大恐慌爆發以後，中國在事實上已變成了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採用傾銷政策的理想園地，益以國內政治的動盪，戰禍與天災的頻仍，致使前此在第一次大戰過程中，因利乘便發展起來的一點民族工業，如紡織業、麵粉業、火柴業等，相繼陷於絕境；而當時由農村動亂，由金融集中到若干特殊大都市，所變態興盛起來的銀行資本，遂相率把它們的活動對象，由都市移到農村。「復興農村」的口號是由此提出來的。由原始蓄積方法從農村征集到都市的資金，儼然要由農村貸款的方式，回流到農村去。此即所謂「資金下鄉」。這種「下鄉運動」是一九三一年即民國二十二年開始的。農村在實踐上被人們特別垂顧的時候，它在農村上是必然會成為人們考察的對象的。

在當時，對於農村經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兩個定期刊物上，其一是由鄧飛黃先生主編的中國經濟，其一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行的中國農村。集中在前一刊物上討論農村經濟問題的是王宜昌、王疑今、王景波、張志澄諸先生，集中在後一刊物上討論同一問題的是孫治方、錢俊瑞、薛暮橋、陶直夫諸先生。而在農村經濟研究上表現了優越見解的陳翰笙先生，以及後來參加論爭的千家駒先生都可算在他們一起。我們這裏沒有充分篇幅指出他們各別的題目與論點，在大體上，他們這兩個壁壘，分別與前一研究階段上呈現的兩個壁壘，保有相當淵源上的聯繫，前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王宜昌諸先生，與上述農、任諸先生是採取同一立場，即認

定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程度頗高，不但農產物，就連農村勞動力，也商品化得可觀了，中國農村經濟已大體是資本主義的了；後一個壁壘中的研究者如孫冶方諸先生，却又在相當修正的立場上，接受了王、潘諸先生強調中國尚是封建主義佔着優勢的說法。他們相互的辯駁，不僅把理論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論上，拓展到了規定一個社會性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研究上，並且就小農、就商品、就雇佣勞動、就原始市場等特定經濟範疇，予以深入的探究。

如把這一次論爭的是非存而不論，論爭的內容與方法，顯然是進步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對於方法論的論難，彷彿是在所研究的對象的中國經濟、中國農村經濟以外來進行，而所論難的有關農業上的諸經濟範疇，又彷彿各自孤立着，而沒有全部系統的聯貫起來。

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需要再進一步，通過一種嚴密的方法論，把由都市到農村的全般經濟事象，統合在一個體系之下，顯示出其基本諸運動規律及發展傾向。

這是留待我們在中國經濟研究第三個階段應做的事，
第三個研究階段，即由七七抗戰起到現在這個階段已經經歷了七八年的歲月，與前兩個階段的時期比較起來，真是相當的長了。到刻下為止，主觀上客觀上便利我們這種研究的條件，確不算少了。如在主觀條件方面，前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都可供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參證。在客觀條件方面，戰爭愈向前發展，我們原有的一點新式產業基礎，愈無法保持，反而是，一向被我們沿海都市方面的作者學家視為已經資本主義化了的大後方，又無所掩飾的暴露了它的實相。而萬分苦惱着我們的落後諸經濟活動，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土地資本的活動，更逼着我們不能再有否認封建傳統經濟成分佔着優勢的口實。現實把認識變單純了。我們在戰時沒有在中國經濟研究的論壇上，發現前兩研究階段那樣的論筆。
但是，戰時不利於中國經濟研究的諸種因素，亦顯然在極有力的作用着。比如，戰時的研究工作，因為受人力物力及其他種種限制的關係，一般是難得展開的。我們知道，戰前許多關於中國經濟研究有相當歷史的刊